在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詹小美 刘 悦

摘 要: 作为反映民族存在的社会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蕴认知与评价的认识系统、协调与支撑的导向系统、凝聚与激励的动力系统, 其价值共意的凝结具象投射共识形成的行为说明、文化之轴的民族框定折射“情感—规范—目标”的结构效用。在现实性上, “认知偏差纠正”“态度分歧扭转”“涵濡情感发酵”构成了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共同体意识的功能指向; 而共同体意识铸牢的文化进路则以危机应对的“共意具象”和“文化框定”的方法论意义, 运用于危机解决方案的情感实践、目标驱动和价值涵育, 即以文化情感铸牢的“互动仪式链”、文化目标铸牢的“集体行动共律”、文化价值铸牢的“认同达致”克服危机。

关键词: 重大突发事件应对;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

中图分类号: D633; D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21)02-0001-08

重大突发事件指“突然发生, 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 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反映中华民族存在的社会意识, 它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相系, 深度聚焦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交往结构和精神风貌。在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中铸牢共同体意识, 着重于中华民族价值共意的文化之轴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认知偏差纠正、态度分歧扭转、情感发酵涵濡中的综合运用, 不仅诠释了社会危机治理模式创新的发展方向, 而且阐释了应对危机社会治理文化建设的践行范式; 不仅强调了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义进行危机应对社会动员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而且在根本性上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导实践的外在化转换。在此之上, 从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共同体意识铸牢的具体问题出发, 聚焦共同体意识具象与框定的价值归旨, 阐发

共同体文化情感、文化目标、文化价值铸牢在应对重大危机实践中的具体生成。“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 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着在一起, 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2]

一、具象·框定: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共意与文化之轴

马克思指出“共同体是一切文明民族的起点”^[3],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能动反应诠释于“共同体不仅仅是指一群人, 它是一个整体”^[4]的思想表达, 其规定性、综合性和多样性的集中体, 指向了共同体意识生成的本质和铸牢向度不仅具有经验层面的个体含义, 而且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寓意。作为56个民族和谐共生的情感纽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藏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五个认同’研究”(16AZD039); 广州市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研究重点基地(2019GZJD02)

作者简介: 詹小美, 女, 广东饶平人,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与价值传播; 刘悦, 男, 湖南岳阳人,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与价值认同。

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发体现了精神意义的价值指向和以文化为载体连接而成的命运与共。正是通过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生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得以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得以形塑;正是“基于共同或者相似的价值观和文化心理定式而形成的社会群体,是一种特定文化观念和精神追求反映在组织层面上的有机统一体”^[5],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不仅凸显了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包容性和吸纳力,而且彰显了民族共同体群体价值凝聚。

在现实性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生存价值共意的具象、发展文化之轴的框定,指向了文化价值意识的共同体表达以及在文化世界中的主体实现,它以人与文化的统一、共同体属性与文化价值的统一、文化积累与价值实现的统一作用于共生关系的演绎,形塑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发展的历史进程。

共同体意识价值共意的凝结具象,投射与客观事物的关系中的群体价值判断,是客体属性在共同体成员头脑中的主观评价和具体运用。审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关系,独特的思想特质和共同体理念以价值体系的深刻诠释构成了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聚合共同体的价值系统具有一定的功能性和层次性。价值系统内括将分散的价值诉求整合为共同体群体推崇的共意形成,涵盖认知和评价客观事物效用的认识系统、协调和支撑群体行为的导向系统、凝聚和激励共同体发展的动力系统。认知系统、导向系统与动力系统之间的彼此联系与相互作用,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意提升的系统结构,内蕴价值表达的稳定性与持久性、价值选择的历史性和继承性、价值升华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经共同体意识核心内容和基本要素表现出来,不仅反映了共同体成员抽象认知、研判需求的发展状况,而且具有形塑行为模式、推进共同体发展的价值赋义。

共同体意识价值共意的系统性阐发,在安德森那里被论证为对共同体所进行的符号性强化和媒介性建构,以及对贯通历史与现实、对象性关系与对象性活动、目标性导引与动力性激发等共享理念的阐释。通过共同体意识建构的文化心理结构、价值

意识结构、民族精神结构,借助言语、仪式、习俗等传统教化,表达“对意义、团结和集体行动的寻求”^[6],并在现实性上为民族成员的价值共意刻写一种群体的推崇。聚焦共同体意识价值共意的具象过程,中华民族的客观性存在是共同体意识萌发的土壤;作为促进共同体意识成长的精神给养,中华民族文化是共同体意识的深层记忆和精神意涵的符号化表达;作为民族生活方式、群体心理、话语体系、行为准则的集合体,中华民族的价值目标奠定着文化价值体系的基础。这一过程与其说共同体成员的价值意识是由文化理念决定的,不如说共同体的文化创造和实践感知、现实反映、能动作用均表现为共同体价值共意所投射的主体性价值实现。

事实上,价值共意具象的共同体意识投射共识形成的行为说明。作为特殊连接方式和交往关系的共同体形塑,这一定向指向了共同地域内具有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言和表现在共同文化之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其伦理意义和社会价值被组织在“共同地域”的强调、“共同利益基础”的阐发、“共同价值取向和善的观念”,这些社会关系以情感深度、道德承诺、社会凝聚力以及时间上的连续性为特征。^[7]反映共同体存在的共同体意识、表达共同体发展的理想愿景,在价值共意系统中的聚焦、社会范式、奋斗目标和关系模型,揭示了对共同性寻求的论证过程。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中华’一词,与‘中国’‘华夏’相通,兼有族名、国名等多重含义。……至近代用以指称包括历史上居住于当时中国境内的一切民族”^[8]。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的共同体意识、承载中华民族价值目标的梦想,生成于中华民族整体存在以及对民族关系的认识、界定和评价,延展于中华民族生命存在圈的根基性向度,升华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价值性向度。二者共生的价值意蕴,生发于中华民族“命运”“利益”“责任”共同体相互融合的结构中,既内含多元一体的归属意识,又涵盖对共有利益和民族尊严的自觉感知。

共同体意识文化之轴的框定,折射“具有事实上或自认为的共同血统、共同文化、共同体质特征以及一整套共同态度与行为举止的人们共同体”^[9]的共同性表达。情感、规范、目标彼此交织、相互

依存、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框架体系作用的制约性因素。其系统性的结构为社会行动者提供了确定的认同,对社会化过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不可退出性决定了构成性共同体的预制性,在卡尔霍恩那里,脱离了自身完整性、脱离了共同体所提供的理解世界的框架,“脱离了共同体纽带的人便不可能真正是个人”^[10];而滕尼斯对除却特定自然基础依赖的共同体阐发,则以“历史和思想积淀的联合体”^[11]的共同体表达,为框架体系制衡要素的价值链接奠定了共同性规约的基础。正因为反映共同体存在的共同体意识,同时预制了实存发展向度中的命运性解释,目标与发展路径抉择的辩证关系,缩影了框架体系所诠释的自由自觉。共同体意识演绎的思想体系,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创造,彰显了中华民族在新时代和新环境下所建构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因此,在框架体系内,凝聚的程度受制于分散的个体走向有组织聚合的共同体释义,以及共同体生存、发展标的、同类价值意识的共同体诠释。

共同体意识文化之轴的系统性阐发,作用于情感、规范和目标的结构效用,联结在价值体认与价值追求所组构的框架里。正因为共同体价值指向的群体意蕴只有在统一的价值共识中才能形成真正统一共同行动,作为一种以地域、语言、传统或血缘等为标识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感召力,是那个“主宰我们的生命、建构我们的政治和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12]的重要力量之一。在此意义上,表征共同体存在的共同体意识,天然地被铭刻着共同体的历史底色和文化特质。在共同体的框架体系内,情感处于最基本的层次,它是规范产生的依据和目标实现的前提;规范列于中间性的层次,秉持着特定的价值标尺和行为准则,判断、择取和调试着成员的思想与行为。目标居于提升性的层次,以特定的主导性作用于情感与规范,决定着框架在性质、方向、效用上的层次结构。情感内蕴多元一体的特性,奠定共同体生存的内在基础;规范外化成员一致的生活模式和行为范式,成为凝聚的外在凭借;目标引领共同体发展向度,成为愿景实现的动力和源泉。情感、规范和目标在场的结构性表达,具有“自足与自恰”的符号学意

义。索绪尔将其阐释为“不但是人类社会最大的符号体系,而且大得不成比例,其他符号体系与之相比都实在太小,而且全都可以被语言混杂、解释、置换”^[13]。

实践中,文化之轴框定的共同体意识贯通身份、关系和凝聚的共同体阐发。首先,表现在框架体系中的身份揭示。成员特定身份的确认和肯定,构成了共同体意识生成的依托和基础。在框架体系内,身份的阐发基于身份识别的情感、共同经济生活的利益交融和共同心理素质的文化意涵。中华民族框架体系阐释的成员身份连接共同体意识,是他们群体特征中最具生命力的根基性部分,是身份识别的重要依据。其次,投影在框架体系中的关系阐释。作为关系的主体,人类历史上任何形式的共同体,都必须在一定的框架内以凝聚成员的内在基点为核心,展开群体活动与群体政治的依据。在这个过程中,权利和义务的交互以个体和群体的基本关系,组成了社会关系作用的结构。在框架体系所规约的关系中,能历经长期历史变迁还能保持鲜明特质与激烈影响的,是表现于共同文化特点之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再次,映射在框架体系中的凝聚阐发。框架体系对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观照,使同类价值意识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特定的生存体现,情感相关于构成社会基本单元的实体及其特质,接续于迥异的组织结构与社会变迁。它以成员共有的、反复起作用的文化精神、心理特质和性格特点的集合体,形构统一而不破灭的内在纽带,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作为社会性的约束机制,规范得益于共同体对象性活动的自觉设立和明确实施,是共同体价值观念的具体化。

二、纠偏·扭转·涵濡: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共同体意识的功能指向

重大突发事件指涉“对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构架产生严重威胁,并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14]。作为具有广泛社会危害性且短时间内难以控制的社会危机,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严重威胁社会的正常运转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无论是直接损害还是间接损

失, 均对社会心理和个人心理造成破坏性冲击, 渗透到共同体生活的各个方面。概言之, 重大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广泛性、持续性以及严重危害性等特点, 它的发生和蔓延对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和百姓生活造成重大损害, 直接影响民众共同体认同的现实表达。从社会影响的阐释范式出发, 透视应对危机风险与挑战并存的社会问题, 它所引发的社会心理问题、情感关切指向、价值失范危害, 不仅作用于共同体应对重大危机时间轴不同节点的策略制定, 而且影响到应对重大危机共同体意识社会动员的空间场。

在现实性上, 监测、预测、预防、控制等针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措施, 构成了社会整体在重大危机下主动介入的常规手段, 其目的在于凝聚社会共识, 消减危机对经济、政治、社会秩序的消极影响, 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因而, 应对重大危机演绎的社会实践需要以共同体意识的认知和评价、协调和支撑、凝聚和激励的社会功能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文化动员, 集中全社会的力量解决危机。作为与中华民族存在相联系的社会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蕴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因而, 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底蕴应对重大突发事件, 不仅指向了共同体认同的意蕴, 而且指向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际。

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凸显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危机解决中的作用。重大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极易对社会整体结构和人们行为准则产生突发影响。危机解决不仅仅是相对狭隘的防控问题, 而且是更大范围内、更深程度上的社会治理问题。正因为重大突发事件引发的非正常状态和非均衡演化在短时间内难以控制, 极大地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而且引发连锁反应, 造成严重影响。因此, 重大突发事件的防控和应对是一项多层次、多部门、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 资源整合、采取的处置应对、组织体系的结构性运行, 不仅指向政府工作的方案集成, 而且指向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9月11日科学家座谈会上所强调的: “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优化配置优势资源, 推动

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15]全社会资源调动和集中的系统性优化, 更是指向了“政府主导、部门配合、民众参与”应对机制的效能释放。在危机应对的预警阶段、救治阶段、后续过程等重要节点上, 社会各部门紧密合作, 以应对突发事件广度与效度的提升为目标, 阻断事件蔓延。因而, 共同体意识所发挥的广泛性的观念引导、深入协调的资源整合和行为应对, 进一步彰显了在应对危机、战胜困难过程中铸牢共同体意识文化实践的重要作用。

检视重大突发事件背景下共同体意识“纠偏”“扭转”“涵濡”的功能指向, 主要体现为在短时间内形成克服危机的社会合力, 进行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的有效调动与配置, 将潜在或分散的社会资源进行集中与整合, 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应对目标。在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的实践中铸牢共同体意识, 即危机响应过程中的思想动员、组织动员、资源动员, 指向以价值理念的引领、制度效能的转换和物质基础的保证所彰显的共同体意识内蕴的系统功能。在这一体系中, 铸牢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动员处于首要地位, “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 反映在人的头脑中, 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 总之, 成为‘理想的意图’, 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16]。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动员正是通过思想、组织、资源的能量集中和有效配置, 有层次、分步骤地调动社会力量, 以全社会行动的一致防范、控制、战胜危机。总括“纠偏”“扭转”“涵濡”的系统功能, 通过社会资源的大量积聚和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 为危机解决提供保障; 通过情绪引导和心态调适, 增强民众克服危机的信心与力量。谓之曰: “积力之所举, 则无不胜也; 众智之所为, 则无不成也。”^[17]

就应对重大突发事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纠正”功能而言, 认知偏差引发“认知”层级投射认知评价的认识系统。民众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认识和对危机解决方案的评价, 是应对重大危机观念形态发生作用的首要方面。以共同体意识认知评价的系统功能切入危机解决的实际, 纠正认识层面的“以偏概全”、克服近因效应引发的晕轮反应、校正先入为主的性质判断, 构成了以共同体意

识铸牢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起始层级。认知是意义建构和观念内化的起点,这是共同体意识知识系统对重大突发事件应对发挥价值共意的系统生成,在共同体成员原有危机应对经验的基础上进行记忆召回,关注与危机解决相系的新的科学知识,以新知识的普及拓展群体应急的知识系统。应对危机解决方案效用的评价,是共同体意识研判系统连接认知、投射现实、指向预期的中介。共同体意识观念系统的评价不仅构成了应对重大危机群体认同演进的中间环节,而且构成了以科学精神延展群体认知的现实策略,这是集分析与综合于一体的辩证的环节。

就应对重大突发事件铸牢共同体意识的“态度扭转”功能而言,因态度分歧引发的“态度”层级折射协调与支撑的导向系统。政府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措施“协调”与政策“支撑”,是应对重大危机社会支持发生作用的重要依托。以共同体意识协调支撑的系统功能投入危机解决的实践,扭转态度层面的认知固化和过度类化、改变认识偏差和意向偏见、回旋否定性的价值倾向和排斥性的情绪反应,构成了以共同体意识铸牢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联结层级。协调是对重大突发事件客观存在的错误认识给予批判、对损害危机应对的错误观念给予抵制。与此同时,凭借共同体意识文化之轴在社会情感、行为规范和应对目标上的思想优势,将分散和相近的态度反应加以转化和整合、将错误偏见加以过滤和消融、将有利于危机解决的社会观点加以抽象和升华,借此改变、重塑、拓展正向态度体验,提供应对重大事件积极态度养成的观念参照系,将自发的态度倾向协调为自觉遵守的态度反应。支撑是指作为重要的理论基础,共同体意识为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提供准绳,为满足危机克服的精神需要提供愿景信念,激发战胜危机的态度效应。与此同时,关注重大突发事件的核心事实、影响渠道和作用因子,解构激化态度偏差的舆论场、进行社会舆论的态度导航,提供引领正向情绪体验态度定向的参照系、消解引发重大冲突的信念歧义,塑造态度治理的群体氛围。

就应对重大突发事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涵濡”功能而言,情感发酵引发的“情

感”层级映射凝聚和激励的动力系统。在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中“凝聚”情感基调的社会共识、“激励”广泛的情感共鸣,贯穿战胜危机的内在性机制、目的性生成、持久性作用和集成性效应,是应对重大危机动力激发的主要依据。以共同体意识凝聚激励的系统功能嵌入危机解决的实践方略中,关照信息感知的安全威胁、事实判断失误引发的情绪波动、情绪感染生成的心理噪音,通过塑造社会正向情感最大化消解负面情绪,构成了以共同体意识铸牢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传导层级。“凝聚”是指为应对重大危机提供思想和行为的黏合剂,建立比较、学习、濡化的解释框架,展示“情感涵濡”在情绪稳定性撕裂过程中的适应、防护、表现功能,消除由高强度灾难性信息传导开启的反应钝化,进行社会凝聚的情感教化。“激励”是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对在克服危机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感人事迹、动人故事进行立体呈现,依托“隐藏感情会更强烈地激起感情”^[18]的文学叙事,传播正向情感价值观,将万众一心、战胜危机的原型融入文艺创造中。

三、情感·目标·价值:应对重大突发事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进路

在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进路蕴含了联系主客体的文化向度和战胜危机社会动员的文化策略,以及二者经共意具象和文化框定形塑的方法论意义上的实践律动。在黑格尔那里,“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同样被列为工具,是站在主观方面的手段,主观方面通过它而与客体相关。主体在这种推论中是一端,客体则是另一端,前者通过它的方法而与后者联在一起”^[19]。探讨在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问题,是以两者相互建构解决问题为目标的系统优化和实践进路的细化,涉及问题形成不同节点的阶段性聚焦和“任务—工具—技巧”等方面的系统投射,以及由各种实施步骤和解释方案集成的一般性原则,伊泽尔将其阐释为“包

含事物内在结构以及由这些内在结构引起的理解活动”^[20]。

在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实践,整合力量、调适心理、整饬情感,以社会基础、舆论导向、情感关注的整体性关切,构成了主体发起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文化实践的基本功能;强化施为、价值引领、动员参与,以制度保证、主动策划、组织实施的结构性聚合,构成了主体发起能量释放作用于文化实践的基本结构。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共同体意识铸牢的客体响应,表征文化实践策略、方式、手段影响下的状态改变、自觉参与和主观能动的增强。文化实践主体发起的效能转换交织实践客体积极响应的参照系、理论框架和组织架构,则进一步彰显客体回应主体发起的交互过程。

作为一种视角、一种判断、一种评价和确定,文化进路包含的发展向度蕴含了事物发展的方向和程度。作为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范式的路径解读,实践进路问题的显现,预示着共同体意识铸牢从中介和普遍性的强调向有效性和情境性的转化,表征了铸牢共同体意识的方法集合从“认识系统”经“导向系统”向“动力系统”的延伸,以及从“初始层级”经“联结层级”向“传导层级”的拓展。铸牢共同体意识认知评价的思维过程,不仅连接协调与支撑活动的进程、凝聚共识的社会支持和群体激励的民众实践,而且拓展于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具体措施所发挥的暖人心、强信心、聚民心功能。共同体意识铸牢进路聚焦的着力点,不仅助力于认知系统、导向系统、动力系统的作用机制,而且助益于文化情感铸牢的“互动仪式链”、文化目标铸牢的“集体行动共律”和文化价值铸牢的“认同达致”,由此彰显了在突发事件应对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定制。其中,文化情感铸牢内蕴意义生产的符号象征、情感话语的言说框架、情感规约的表意语境,作用于应对危机的情感氛围塑造;文化目标铸牢的垂直递移与横向链接范式,观念动员加行为动员聚焦的方向阐释与行为导航模式,作用于应对危机的目标引领演化;文化价值铸牢的思想涵化、价值引领、共识达致,以文化创作、文化作品、文化载体

的价值再生产,涵育应对危机群体动员的社会支持。

审视应对重大突发事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进路,文化传统以符号要素和情感卷入的基础性表达奠基着文化情感的原生性律动,文化阐释以社会系统秩序化的生成要件承载着文化目标的概念性图景,文化自觉以群体理论的内化和行为理论的践行固化着文化价值的表意性图式。文化意义对原生性律动、概念性图景和表意性图式的集成,对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心理调节、力量整合具有重要意义。“行为主义和其他还原论的人类行为理论的长久而复杂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21]聚焦文化情感培育的效用,投射其“纠正认知偏差”的功能在相互关注与情感连带交互过程中的实现,其中,情感嵌入的瞬间实在、情绪唤醒、情感卷入的体验共享,以情感实践提升满足感;探寻文化目标培育的效用,折射其“扭转态度分歧”的功能在个体意识与集体符号目标联结中的实现,其中,行为规约的方向预设、目标导引的内涵阐释,以实践关系的目标展演提升认同感;探讨铸牢共同体意识文化价值培育的效用,映射其“涵濡情感发酵”的功能在价值整合与价值协调凝聚中的实现,其中,价值实际功效的检视、利益要求的集中表达、动员方略的价值定位,以“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22]提升社会成员的获得感。

在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中培育共同体意识铸牢的文化情感,主要依据“互动仪式链”的作用机制,即依托情感符号作用的实践坐标、应对危机情感触动的参照系、通过情感连带调适情绪的行动方案,运用于纠正认知偏差、调整态度偏颇、整饬情绪波动等共同体意识铸牢的情感实践中。通过诉诸情感的心境、热情和激情,汇聚应对危机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动态链接自我建构与匹配性建构,激发积极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认知、情绪、评价,进行正向情感沉淀和社会心态整合,力求达到社会情感能量最大化,建构共意提升的情感图式。概言之,作为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中的情感生产方法,情感秩序与文化规范的符号交换彰显了“符号瞬间”意义阐发的行动移置和联结情感共鸣的符号转码,情感安抚以共在、共通、共意的共同体诠释深度挖掘文化符号的情感具象、深层拓展能量释放的情感

触动;通过共同体意识言说框架和表意语境的情感话语和情感规约,赋予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共同体意识铸牢的情感蕴涵;将铸牢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话语贯通文本表达、沉浸方式、亲近性文本择取和调节性表意语境,系统释放隐喻、转喻、凝缩、解压的情感作用,营造情感空间;综合运用文化话语构成方式、概念范畴的框定模型、媒介场景的具象体验,进行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凝练。

在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中明晰共同体意识铸牢的文化目标,主要凭借行动共意的组织协调,关注“垂直递移”加“横向链接”作用的实践坐标,关注目标驱动的具体问题,对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行为施以积极的影响。有效利用文化方式积淀于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习惯,在危机应对的具体实践中将目标意向合理地组织在日常生活里,从平凡的共同体交往方式入手诠释目标意蕴,全方位塑造乐观面对的社会氛围。概言之,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中的目标生产方法集合,意味着“把社会问题转入集体行动,这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社会行动者、媒体和社会成员共同阐释、定义和重新定义形势的过程”^[23]，“媒介技术”加“平台创新”、“传统媒体”加“社交媒体”的传播联动,对重大突发事件进行实时报道、归因分析和理论透视;将目标铸牢实际运用的因果样式嵌入媒介叙事的社会阐发中,凸显目标实现和路径传导的同频共振,充分运用危机应对的“焦点事件”进行目标审视、知识共享、前景预期,分段聚焦危机爆发、防控过程,后续监测不同时间节点和作用空间的应对目标阐释,借此提振铸牢共同体意识战胜危机的重要梯级链接。

在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中阐发共同体意识铸牢的文化价值,主要彰显文化生产的价值产出功能,即应对危机文化创作、文化产品、文化载体的意义、内容、形式再生产实践范式的框架搭建,发挥优秀作品鼓舞士气、引领人心的凝聚功能,增强社会公众应对危机集体行动的价值培育。概言之,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中的价值生产方法集合,投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24]的特质,以主题鲜明的文化创作凸显社会效益,“展现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精神风貌”^[25],以深入精神

世界、触及灵魂以及引起价值共鸣的文化作品产出来应对危机;充分运用共同体意识价值共意的具象功能,映射“文化要素潜移默化的滋润、浸润和濡染”^[26]的价值养成,以文化作品陶冶精神、温润心灵、感化育人,进行价值引领和精神塑造,为危机应对整合价值、凝聚共识;充分展现共同体意识文化之轴的框定功能,系统凝练文化载体传导共识的作用样式,关涉诗歌、音乐、影视、短视频、书法、摄影等文化载体的运用,以技术驱动提升应对危机的价值引领、以形式优化增强凝聚共识的内容魅力,以危机防控的明确传导对用户圈层进行分众化、差异化、精准化内容定制,为广泛的社会动员提供价值导向。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典[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6: 397.
- [2]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9-09-28(2).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六卷(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412.
- [4] 李义天. 共同体与政治团结[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9.
- [5] 傅才武, 严星柔. 论建设21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5): 63-74.
- [6] DELANTY G. Community[M]. London: Routledge, 2003: 3.
- [7] NISBET R A.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M]. Heinemann, 1970: 48.
- [8] 陈永龄, 宋蜀华, 刘荣暖, 等. 民族词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7: 146.
- [9] 汝信. 社会科学新词典[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8: 1246.
- [10] CALHOUN C. Community: Toward a Variable Conceptualization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J]. Social History, 1980(1): 109.
- [11] 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 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 林荣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2-3.
- [12] 罗斯金. 政治科学: 第6版[M]. 林震, 等,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31.

- [13] 赵毅衡. 符号学一百年[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9.
- [14] 李鹏. 公共危机事件的网络传播与舆情治理[J]. 东岳论丛, 2012(9):140-143.
- [15] 习近平. 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0-09-12(2).
- [1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285-286.
- [17] 习近平. 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 人民日报, 2017-01-18(3).
- [18] 杜志红, 焦彦艳. 灾难报道情感信息处理的范本——试析央视《抗震救灾 众志成城》[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08(10):60-62.
- [19] 黑格尔. 逻辑学:下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6:532.
- [20] 伊泽尔. 阅读活动:审美响应理论[M]. 霍桂桓, 李宝彦, 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86.
- [21] 萧俊明. 文化转向的由来[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93.
- [2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419.
- [23] 西德尼·塔罗. 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M]. 吴庆宏, 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5:147.
- [24] 白居易. 与元九书[EB/OL]. (2020-04-13). <https://baike.baidu.com/item/与元九书/8973034?fr=aladdin>.
- [25]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N]. 人民日报, 2020-02-04(1).
- [26] 詹小美, 揭锡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涵濡[J]. 青海社会科学, 2019(5):9-16.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in Response to Major Emergencies

ZHAN Xiaomei LIU Zhuo

Abstract: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is a social consciousness that reflects national existence. Its cognitive system of inner cognition and evaluation, orientation system of coordination and support, dynamic system of unification and motivation, and concretized common values reflect its behavior description formed by consensus; the national frame of cultural axis reflects the "emotion-norm-objective" structural utility. In reality, the functions of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in dealing with major emergencies are to correct cognitive deviation, neutralize attitudinal differences, and cultivate emotional fermentation. The cultural approach strengthened by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is of the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concretized common connotation" and "cultural frame" in response to crises, which refers to the emotional practice, goal-driven mode, and value education applied to crisis solutions. The "interactive ritual chain" forged with cultural emotion, the "collective action protocols" stipulated with cultural objectives, and the "identity agreement" reached with cultural values are employed to overcome crises.

Key words: response to major emergencies;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strengthen